

基金资助:

湖北省软科学项目基金(编号:2015BDF03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编号:SWSZK2015Z11,SWSZK2015Y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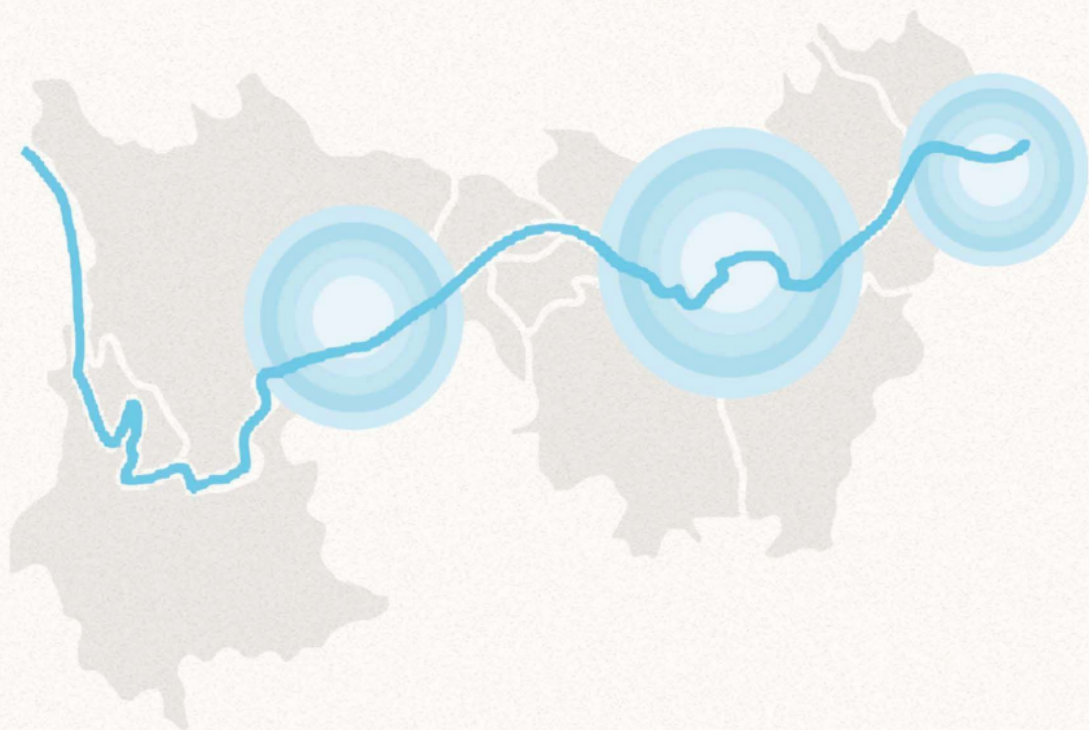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开放基金(编号:HBQY2015Z05)

武汉市城市圈创新合作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资助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与 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和协同研究

CHANGJIANG JINGJIDAI CHANYE JIJU YU XINXING CHENGZHENHUA DE GUANLIAN HE XIETONG YANJIU

杨树旺 李奇明 李会琴 吴超 编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DIZHI DAXUE CHUBANSHE

基金资助

- ◆ 湖北省软科学项目基金(编号:2015BDF031)
-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编号:SWSZK2015Z11,SWSZK2015Y06)
-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开放基金(编号:HBQY2015Z05)
- ◆ 武汉市城市圈创新合作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资助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与 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和协同研究

CHANGJIANG JINGJIDAI CHANYE JIJU YU XINXING
CHENGZHENHUA DE GUANLIAN HE XIETONG YANJIU

编 著:杨树旺 李奇明 李会琴 吴 超
参编人员:唐鹏程 潘天洋 付 强 李振华
 张径伟 孟 楠 彭欣源 江奇胜
 吴 婷 付书科 俞艳霞 郑 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和协同研究/杨树旺,李奇明,李会琴,吴超编著.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25-3073-2

I. ①长…

II. ①杨…②李…③李…④吴…

III. ①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关系-城市化-研究

IV. ①F127.5②F29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466 号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 关联和协同研究

杨树旺 李奇明 编著
李会琴 吴超

责任编辑:胡珞兰

责任校对:周旭

出版发行: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 号) 邮政编码:430074

电 话:(027)67883511 传真:67883580 E-mail:cbb@cug.edu.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http://www.cugp.cug.edu.cn>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152 千字 印张:7.75

版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武汉壹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数:1—300 册

ISBN 978-7-5625-3073-2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两大问题。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要求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刚性约束得到有效解决,这样才能为城镇化发展腾出能源空间,实现工业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市病”与“半城镇化”问题的存在要求加快建立城镇空间布局和发展体系,促进资源向各个产业节点均衡流动,加强产业集聚对市场要素的引导作用,促进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前沿阵地,区域融合协调发展是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支撑,这同样需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笔者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以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基本出发点,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四大层面,全面系统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劳动力要素流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在问题的研究和内容的写作过程中,本书立足于从不同方法角度加以探索和创新。借助以下方法加以研究:第一,动态因子分析法。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需要构建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动态因子分析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客观赋权法中权重存在的纵向不可比问题,而且能够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动态的测度。第二,动态面板 GMM 方法。本书选用长江 9 省 2 市以及主要地级市作为研究单元,从劳动生产率、产业结

构、区域一体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4 个层面,就城镇化质量、产业集聚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探讨,是面板数据的动态比较。课题选用动态面板 GMM 进行估计,对变量间内生问题及动态问题能够做出回答。第三,文献资料法。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对产业集聚及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把握,为本书研究目标定位、研究方法设计奠定了基础。第四,比较分析法。通过搜集长江经济带相关统计数据,对不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及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本书的创新点体现在:第一,根据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区域一体化及生态环境的不同角度形成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间的系统化互动机理。在我国大力推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下,产业集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的有力支撑;城镇为产业的集聚提供地理空间载体,产业以及产业内企业间在区域内通过合作与交流寻求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产业规模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能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提高城镇化水平,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提供有力的支持;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后将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的胁迫对城市发展产生约束。第二,借助动态面板 GMM 方法对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有关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区域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四大方面的动态互动规律实证研究,并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得出不同城镇化进程的产业集聚协调问题研究成果。

编者

2015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6)
第三节 研究内容	(11)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13)
第一节 文献回顾	(13)
第二节 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	(22)
第三章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度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36)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度测度	(36)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48)
第四章 基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关联分析	(56)
第一节 理论基础	(56)
第二节 研究设计	(58)
第三节 实证分析	(61)
第四节 结 论	(64)
第五章 基于区域一体化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关联分析	(65)
第一节 理论基础	(65)
第二节 实证分析	(68)
第三节 结 论	(70)
第六章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关联分析	(72)
第一节 理论基础	(72)
第二节 实证分析	(75)
第三节 结 论	(79)
第七章 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关联分析	(81)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及分析	(82)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实证研究	(89)
第三节 结 论	(99)
第八章 促进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的政策建议	(100)
结束语	(104)
参考文献	(10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城市发展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的发展,有利于人口和资源的集聚,推进分工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文明。在国内,城镇化是与城市化内涵相同的概念,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农村角度来看,表现为人口向城市内非农产业转移,并因此受到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从城市角度来看,表现为规模化和密集化及第二、三产业集聚,城乡物质精神文明互融互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历史任务,它能够扩大内需,有利于解决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我国政府将长江经济带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建设长江经济带,目的在于打造沿海与中西部良性互动、相互支撑的新局面。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显而易见将成为未来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长江经济带要秉承“改革引领,创新驱动;通道支撑,融合发展;海陆统筹,双向开放;江湖和谐,生态文明”的发展原则,致力于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当前,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发展速度处于换挡期、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新常态的突出表现包括中低速、优结构、动力新、挑战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党中央、国务院谋划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做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利当前又惠长远。

《指导意见》指出:我们必须以沿江的国家级、省级技术开发区为主体,发挥大型企业的骨干力量,逐步打造由汽车、家电、电子设备等产业构成的世界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另外,我们必须在强调互动协作、区域集聚的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从以人为本、优化格局、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这些方面提高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可见,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是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问题。

自长江经济带概念提出后,理论界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长江经济带的范围究竟包括什么地区存在着争论。1995 年底,长江经济带的地域范围包括长江三角洲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3 个省(直辖市)14 个市和沿江地区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 6 个省(直辖市)23 个市。2013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确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 9 省 2 市划入长江经济带范围。2014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召集长江沿线 11 个省市的主要负责人讨论长江经济带建设,这是明确的信号,长江经济带范围自此得到国家层面的确定。

具体来讲,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9 省 2 市,面积约 $205 \times 10^4 \text{ 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流域性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两大区域城市群。

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首先开启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产生了“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房价过高、人口过多、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逐渐增多,成为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障碍。“大城市病”现象的出现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虽有速度,但质量并无保证,“半城镇化”严重。例如,农民工就业、劳动、收入、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家属、积累和根基在农村,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市病”和“半城镇化”并存,导致大城市的过度开发与中小城市的不景气、县域经济的发展困难并存,我国城镇化存在空间巨大但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的“两难困境”。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产业集聚对市场要素和创新创业要素的引导作用,发挥产业集聚的生产效率提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生态环境保护效应,推动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一、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与世界经济体的融合和摩擦将不断增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波动将深刻地影响我国经济的走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变革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也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内容。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和格局的变化将受到科技进步、人口结构和能源约束的影响,总体进入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期,高新技术全面产业化、人口红利仍然存在、能源约束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得发展的主动权。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变量。我国虽然总体发展平稳,规模不断壮大,但人类历史上“以强凌弱”和“以暴易暴”的丛林法则生生不息,我国的强大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引起经济

政治领域的众多纷争。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低迷,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竞争与日俱增,带给我国双重压力。

从高新技术产业全面产业化的角度来看,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世界性国家大都市,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2011年世界城市统计资料表明:东京GDP总量3139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位,其次为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排名前20位的世界级城市中,美国有10个城市,日本有4个城市。我国上海以2536亿美元的GDP产值排在第18位。日本东京GDP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17%,而同年上海GDP占中国GDP的总量为4.1%,北京市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3.3%。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总量约为52%,北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8%。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加快推动这些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全面产业化,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城镇化步伐发展最快的地区。2011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城镇化率高达88.9%和8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8和3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发挥出规模效应,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些地区的布局 and 集聚。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将达6亿,城镇化率将超过60%,更多的农民将变成市民,同步带领高新技术产业在更高的平台上及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全面产业化。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世界人口开始高度向城市集中,城镇化迅速推进。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1950年,居住在城市的世界人口约7.5亿;到2000年上升到了近30亿;2003年,世界上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8%;2010年,达到了50%以上。世界城市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2%,却容纳了地球一半左右的人口。据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约为86.4%,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率也可达到61%。在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各国从众多的劳动人口生产率提高过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劳动力增多,抚养率相对下降,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随着我国人口逐渐步入老龄化阶段,过去30多年中收获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社会结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今后20年内,我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城镇化的加快会通过人口的区域迁移释放出较大的效率潜力,进而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红利消失,通过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新进入城市的大批劳动力转化成为知识型劳动力、技术工人和劳动密集型工人,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生力量。从能源约束的角度来看,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低产值、高能耗的生产模式造成了我国经济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经的“能源危机”刚性约束时代。如美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每天石油消费量的60%依靠进口,人均能源消费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6.6倍。

所以,能源约束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是日本的 53%,如果我们能达到日本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差不多在我国现有水平上提高 1 倍),那么到 2020 年实现我国 GDP 翻两番、能源消耗翻一番的战略目标是不难实现的。

这里必须提到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很多相像的部分,在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知识外溢必然会导致产业集聚及产业转移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投资环境优越,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占据了国际产业转移总资产的半壁江山。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影响扩大,越来越多的服务产业和先进技术转移到了国内,尤其是近些年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更扩大了这一现象。城镇化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政策,这一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产业的转移和集聚,直接表现为非农产业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

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发展来看,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破解能源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为城镇化发展腾出能源空间;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二、预防“城市病”与“半城镇化”的需要

纵观过去的城镇化进程,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与此相伴的城市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房价过高、人口过多、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逐渐增多,“大城市病”成为城市能级和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障碍。“单一中心”和“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交通拥堵,热岛效应丛生;城市人口众多导致环境事件、治安事件频发;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带来人口的集聚,但房价过高、居住困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稳定性。可以说,我国“城市病”问题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伴生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与城市人口生产、生活、消费增长需求不相适应,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直接表现。

我国城镇化率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虚”增长,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也被计算在城镇人口之列。实际上,农民工就业、劳动、收入、生活在城市,户籍、家属、积累和根基在农村的生活状况,导致“半城镇化”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待遇,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无法保障;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工家属长期处于生产、生活重负之下,“留守儿童和妇女”“空巢老人”等问题日益严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归属感不强,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城市生活,致使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农村的土地之上,不愿意放弃承包土地进行土地

流转,导致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存在一定阻力。“城市病”和“半城镇化”并存,导致大城市的过度开发与中小城市的不景气、县域经济的发展困难并存,我国城镇化存在空间巨大但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的“两难困境”。

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建立城镇空间布局和发展体系,促进资源向体系的各个节点均衡流动;推动产业集聚,加强产业集聚对市场要素的引导作用,推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三、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长江经济带区内各省市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2012年,总体来看东部省份城镇化率达到66.1%,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46.8%和41.4%。东部地区人均GDP约为64300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2倍和2.7倍。对外贸易方面东部地区优势明显,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进出口贸易占长江经济带的比重分别超过55%和85%,中西部地区则占比较小且相差不大。交通运输量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大,客运货运绝对值中部为最高。旅客周转量指标以中部为最高,货运周转量方面则是东部占据超过半数的份额,西部的各项数据皆列于末位。近年来,中西部省市经济增速明显加快,2008—2012年,中西部经济增幅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2008—2012年,东部经济所占比重由50.06%下降到46.16%,而中部和西部则分别由29.13%和20.81%上升到31.61%和22.23%,但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仍然存在。

长江经济带的内部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在三大城市群内的地位显著,用了不到1/7的面积和不到1/3的人口,就创造了三大城市群超过一半的GDP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且由于“长三角”地理位置的优势,“长三角”城市群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另外两个城市群的10倍以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面积和人口指标上位居第一,但是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进出口贸易总额、人均GDP等指标则略显不足,经济产出效率不高;成渝城市群在各项指标上均位列末位,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都不高。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内“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规模和经济产出效率上均较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规模较高,但经济产出效率较低;而成渝城市群不论在经济规模和经济产出效率上均较低。长江经济带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整体呈现出自东向西发展水平不断弱化的经济格局。

在本书中,“区域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产业集聚与城镇体系。集聚经济特别是产业的集聚推动了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集中表现为人口、土地、交通等要素围绕产业在某一地区形成的集聚。根据人口、土地规模和交通的便捷程度,产业结构会有所不同,形成较大、较发达的城市和较小的欠发达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口结构发生

变化,进而对城市(城镇)体系也产生影响。而城镇体系会依托中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副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其他中小城市的基础性作用,对城镇体系建设、就业、生活、公共服务等产生影响,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其次,内需增长与区域协调。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地区间生产和消费需求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区域间协调存在较高的成本。但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较低,内需市场规模巨大,要求我们在规避区域协调成本的同时,加快推动城镇化,不断扩大内需。

最后,区域协调与城市群发展。由于长江经济带包含众多省份,经济总量差距较大,彼此间发展不均衡性,这就要求多个城市群共同协作,大、中、小城市间协调发展,多点带动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即实施多元发展的战略,强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群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有限开发区。作为一种新的地域单元,它不仅作为主要空间形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因此,城市群既是区域内城市构成的经济互通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也是各个城市圈共同构建绿色生态环境、繁荣文化环境、和谐共享环境的环文的环保共同体,是城乡统筹发展、互帮互助、繁荣昌盛的城乡共同体。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城市群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综上所述,区域融合协调发展是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支撑,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前沿阵地”,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产业集聚

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Marshall)。马歇尔在1920年发现并分析了同一产业中出现的大小企业地理集中现象,提出了“产业区”概念,他从产业集群与外部经济间紧密的相关关系出发加以分析,对同一区位集中了较多外部经济企业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归功于经济外部性,经济的外部性又主要包括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以及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地理学家韦伯(Weber)最早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并在分析单个产业的区位分布时,首次使用集聚因素。此后,廖什(Losch A)等学者对集聚经济进行了进一步阐述。随着学者们对集聚经济的不断

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理论开始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将集聚经济带上了新的高峰,“钻石模型”显示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包括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撑和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 4 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加以延伸。其实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产业集群,相应的一个国家在某个地区的竞争力也就重点取决于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波特将产业集群这样定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般把产业集群定义为在某种产业领域内,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相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高校等)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它主要由核心企业、配套企业、中介机构、销售商、规制机构这五大部分构成,既经常取决于本地企业之间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又会涉及到某些地域的历史根源。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和效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禀赋。根据比较优势的相关理论我们知道,区域的要素禀赋决定它适合发展一些什么样的产业。无论是过去还是近些年,资源禀赋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另外空间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一些没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地区也可能发展并形成产业集聚,经济活动在初始禀赋条件相似的地区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2)供求因素。Porter 认为相关产业的地方需求是除了要素成本优势之外的另一个可能触发产业集群的因素。Becattni 认为新产业区形成由区域内大量中产阶层出现产生的需求条件和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信用体系代表的供给条件决定,并且会形成由价值观念、行为、制度、知识等构成的多元文化系统。

(3)劳动力成本。韦伯认为如果在一个新的区域内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比运输成本带来的资金要少,企业的布局选择就会从运输费用指向型变为劳动费用指向型,会使用劳动系数和劳动力成本指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其他限制条件下,由于市场的逐渐扩大和价格指数的集聚作用,产业最终都会与周边地区形成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

(4)运输成本。对于同一种商品而言,在同样的市场价格情况下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是增强其在市场上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集聚的利益超过成本,企业由于集聚力的作用开始集聚;而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运输距离产生的成本比集聚经济带来的利益要高,企业一般不选择集聚,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分散布局。

(5)创新。Friedman 从创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这两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区域创新。他指出供给条件主要是指区域存在诱致创新的技术和金钱外

部性,而需求条件则主要是指区域存在需要创新的压力。伴随区域间协同发展而产生的信息传递会引致创新的技术外部性,这与区域文化的异质性、信息的多样性、松散的权利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创新过程的制度化的现象有关。

(6)产业关联与外部性。产业间协调发展与产业向前发展或者后退现象的关联性。从钻石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Porter 集群理论重点指出生产要素与需求条件是集群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产业集聚过程中资金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各自发挥作用,另外他还强调了资金外部性对于集群发展的作用。

以上因素是决定产业集聚现象发生和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另外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附加的积极效应会不知不觉地随之产生。首先,产业集聚能够产生知识的外溢交流和规模庞大的熟练劳动力市场,由此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个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其次,同一个区域属于相同行业的许多企业可以共享区域内的基础设施,这将会节约大量的社会基础建设成本。产业集聚带来的正向效应最终体现为企业生产平均成本的下降。根据 Kaldor 对集聚的定义,产业集聚加工活动会产生递增的规模收益效应,这能够节约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积累自身增长优势,为思想和经验的交流创造很好的机会,同时更好地促进人类生活中的分工。

本书中对产业集聚进行如下定义: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彼此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货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包括大学、智囊团、职业培训、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的集聚体。集聚体中的每个个体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既竞争又合作,由于具有同一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产业集聚中不仅有企业主体,还存在大量的如地方政府、协会、各类中心和研究机构的中介机构。

二、新型城镇化

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师 Serda A 首先提出了城镇化(Urbanization)的概念。然而从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城镇化起源并非始于此,早在此前工业革命开始时就启动了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在经济学中,城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和扩展的过程,其基本含义是指由工业化引起的人口在城市的集中过程。从 Urbanization 一词的解译含义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城镇化”一词源于英文 Urbanization,前半部分 urban 意为都市的、市区的,而后半部分 ization 由 iz(e)+ation 组成,意为“……化”,表示进行某种行为的过程。尽管城镇化一词提出至今已经有 140 多年了,但由于城镇化过程过于复杂,而且涉及到众多其他学科,学界对城镇化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未有定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人口向市、镇集中导致城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城镇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

当前,学者们在提到城镇化时,不仅会强调其中的人口转移和集中,同时也会突出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转变。李克强总理就曾指出,城镇化的内涵中更重要的是实现人居环境、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从“乡”到“城”的转变,而不是简单的城市面积扩张和人口比例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报告指出我国目前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镇化,是兼顾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生态宜居、节约集约、和谐发展方方面面的城镇化(表 1-1)。

表 1-1 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的区别表

区别	传统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
目标不同	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侧重的是城市的发展	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全面转变的城乡一体的发展
内容不同	强调土地的城镇化	强调以人为本
动力不同	强调外向型的工业化的带动	强调了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互动
手段不同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	市场来主导,政府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基本路径	不可持续	强调信息化技术创新作为重大的推动力,强调环境的承载力,强调社会的均衡与和谐,是可持续的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差别》。

三、区域协调发展

一般而言,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是效率或趋利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通过市场机制将会较大幅度地实现资源空间配置的效率目标。但是,仅仅依靠单纯的市场力量,将会增加地区差距(Myrdal,1957)。自改革开放后,我国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发展重点区域,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但随之而来的是结构性产业失衡与区域失衡问题也日益显著。有国内学者指出,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央所贯彻实施的“顺市场调节”区域政策将是不必要的,因为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方式也能实现同等目标(魏后凯,2007)。据国际其他地区的经验,各国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多是面向各类问题区域展开,例如发展落后区域、萧条或衰退区域、膨胀区域等(张可云,2005)。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制定和颁布了多项有关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重要政策,2010 年末,国务院在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指出了未来国土开发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格局,并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新理念和原则;同时,明确了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相关绩效考核评价

办法,这一规划表明我国实现了国土空间开发规划的零突破,也标志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真正意义上的形成。这些规划和指导意见,促进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积极的变化。有资料表明,2012 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投资增幅均高于东部地区,我国空间布局更趋协调和科学。综合来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区域间经济社会差距仍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平均化程度不高,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从地区层面来看,区域间协调合作发展的机制尚不完善,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相分割的客观矛盾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缺乏长期合作的积极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应该着力于解决缩小地区差距、推进主体功能区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深化国内区域合作、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推向深入。

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和不断升级的过程。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度量标准和水平也不同。保持产业间协调发展和最高效率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原则。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则是力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则需要产业结构合理化。如果一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就无法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步伐,产业结构高级化从动态趋势的角度要求,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从合理化状态向更高层次合理化发展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经济增长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相对较多,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以下 4 点:

(1)环境因素。在工业化以前,随着生产和生活中废弃物的增加,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污染问题和环境资源短缺的矛盾。因此,生态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作用才逐渐受到了人类的重视。经济学家们也因此将环境因素引入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中,从而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出现。

(2)人口因素。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既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人口主要提供劳动力资源,而在经济发展中则主要为人的需求。因此,人口对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制约作用较强。

(3)技术进步因素。技术进步则是在其他生产力要素不变的条件下,扮演着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减少其他制约经济增长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技术革命往往引发产业结构的巨变。

(4) 经济发展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变中起着最基本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经济发展因素可以归纳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程度、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等。

第三节 研究内容

本书以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为实证检验对象,分析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机理和协同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机理研究。本部分首先梳理现有相关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文献,归纳理清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脉络和成果。首先,建立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响应和反馈机制的概念模型,从支撑作用、拉动作用和载体作用 3 个方面分析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机理,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搭建理论基础;其次,拟采用相关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集聚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从统计上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及演进趋势;最后,对长江经济带不同的产业集聚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展开比较分析,以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的产业集聚现状、新型城镇化情况和空间差异。

第二部分为基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实证分析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关系密切。本部分拟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在长江经济带内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差异的可能性,考察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同时,实证检验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报酬递增的地方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正向影响,并分析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对产业基础地位的稳固、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的影响。

第三部分为基于区域一体化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实证分析研究。区域一体化包括商品和劳务市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即从整体上衡量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一体化水平与产业集中率关系日益密切,地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产业的集中,而产业集中率也成为理解产业空间分布和地区差距的重要依据。本部分拟从地区一体化的概念出发,计算各省份的地区专业化指数和产业集中率,用以代表其地区一体化水平,实证探讨区域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联性。

第四部分为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实证分析研究。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之一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而产业集聚有利于产